

虎林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虎林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目 录

晚年的回忆

——我在完达山区参加抗日斗争
的经历……………

单立志 (1)

孤岛红旗

——记虎林独立团的组建、壮大
和战斗历程……………

张明一 马天良 范垂政 (42)

为抗联七军筹军需……………刘翰章 (74)

抗日联军在虎林县的密营根

据地及游击区……………曲 波 (79)

日本鬼子欠下我家的血 债 ……李连生 (92)

支援抗联打鬼子

——甘士仁老人在抗击日寇年月
里所经历的几件事……………

杨 野 (118)

支援抗联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冷连文 纪洪宽 (129)

李双德脱险记……………刘翰章 (134)

徐勇支援抗联的几件事……………刘翰章 (141)

将军岭……………刘 焘 (144)

三个抗联侦察员……………焉忠镇 (150)

高山与平原间的王家屯……………曲 波 (156)

集团部落政策下的康德屯……………曲 波 (164)

虎林伪满劳工初记……………刘翰章 (172)

出冤枉劳工差点丧命

——记义和乡镇兴村老农民赵凤

歧伪满时的遭遇……………

杨 野 (190)

我给鬼子挖煤……………张 彬 (199)

李玉成锹劈三害……………刘翰章 (202)

我当伪满国兵的经历……………官克礼 (208)

勤劳奉仕队是人间地狱

——记伟光乡幸福村老支部书记

李洪喜在伪满时受的苦难……………

杨 野 (212)

日伪统治下的泰和村……………高文卿 (221)

乔西坡匪帮覆灭记……………范振义 (226)

一个妓女的自述……………姜红喜 (232)

晚 年 的 回 忆

——我在完达山区参加抗日斗争的经历

单立志

我191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东沟县，从记事起，家里就很穷，全家生活全靠给地主扛活来维持。我的童年是在给地主放猪、放牛中度过。十三岁那年随二叔到丹东市（原安东县）八道沟纺织厂当童工，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，还经常挨打受骂。家庭人口多，父亲又有病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，在我十七岁那年全家逃荒到黑龙江省虎林县，仍然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活。

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，1932年入侵虎林县。看到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奸淫烧杀，残酷镇压，引起我极大的愤怒。1935年春，我毅然地参加到抗击日寇、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去。开始我参加反日救国会（1935年春），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7年2月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。曾在

七军先后担任过战士、排长、指导员等职务。1945年8月15日东北解放后，我到呼兰、巴彦两县搞接收、三建、（建党、建政、建军）工作，完成任务后被调到哈北治安总队任政委（后改编为第二军分区五团任政委）、后又任松江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长、第一军分区独立团政委、独立七师后勤部政委、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后勤部、卫生部政委等职。1958年5月转业到地方军垦预备七师，任农场党委书记，同年11月任佳木斯造纸厂党委副书记，文革期间到辽宁省轻工业厅做临时工作。1973年恢复了厅级待遇，做顾问工作，1983年离职休养。

（一）

完达山区的深山老林里，从1932年起就有抗日联军在活动。随着抗联的出现，密、虎、宝、饶、富等县的广大农村，都先后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，为抗联提供军需、搜集情报、补充兵源，以各种方式支援抗联。虎林县东北的四方林子，是

我的第二故乡。那里山峦起伏，林木茂密，依山傍水的山谷、平川，离离拉拉都有人家。由于这里地处偏远山区，住户分散，日伪统治薄弱，人民纯厚朴实，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。自1933年起，徐凤山、毕于民等人就到我的故乡宣传抗日救国、发动群众、建立抗日组织，因而我的乡亲觉悟较高。我在1935年春，通过同乡梁明德介绍参加了人民救国反日会。不久我就成了地方工作的骨干分子，做地下交通工作。我的家也由于地处偏僻，左右没有邻居，成了反日会的交通站。于是我成了大忙人。为反日会传递情报，给抗联买布匹、胶鞋、药品，找人修理枪支，再带人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等一批批军需品送进山里抗联的大部队。

我还参加慰问抗联的工作。反日会带领群众赠送抗联的慰问品有牙具袋、小手帕、烟荷包……，都很精致，上面还有绣字，都是热心的妇女亲手制成的。抗联战士接到手，看着上面“抗日救国”、“坚决杀敌”等火辣辣的绣字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纷纷表

示不驱逐日寇决不还家。这些小物件的分量是这样重，所以我在这项工作上很认真，但是也最担心。因为这些东西是来自千家万户，我得一户不拉地去收集起来，最容易暴露。我时刻都在绷紧神经，提防“狼犬”的眼睛，利用夜晚组织若干人去送。

由于我经常为反日会传送情报、通信联络，因而接触抗联领导同志的机会比较多，如毕于民、徐凤山、黄太浩、金品三、沈景淑、金成龙等同志我都见过，他们从山里来都必须、也不时地到我家。通过我得到敌情然后再到各处去工作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多知道一些革命道理，做事更谨慎，多几分警惕性，这对我的成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。

1935年10月的一天晚上，徐凤山同志来到我家，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接到情报，说日伪讨伐队包抄上来了。如果让徐凤山同志走，将被敌人发现，不走，我能担得起这样大的危险吗？也是急中生智，忽然想起我家房后干草垛下的菜窖子，我便把徐凤山同志隐藏到那里，并约定

了暗号，在没得到暗号前，外面即使翻了天也不要出来。我安顿好，前前后后检查一番，认为看不出什么破绽，回到屋里，随即敌人就到了。

气势汹汹的敌人把屋里屋外翻个遍，最后到房后的干草垛旁，端起刺刀连戳带挑，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。直到草垛掘乱了才住手。我刚安下心来，两把刺刀明晃晃地对准了我的胸膛，鬼子厉声问道：“你的，是不是红胡子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的，苦力的干活。”又问：“你的，知不知道、红胡子的哪里去了？”我说：“红胡子的，没有来我的家，他的哪边去了，我没看见，看到的一定报告。”翻译是中国人，他看我面不改色，应对自如，便和鬼子叽哩呱啦一阵，就都滚了。

我估计敌人已经去远了，到房后拍了三下巴掌，扒开垛底，掀起窖盖，徐凤山同志出来了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：“你冒全家性命危险掩护我，多谢了。”我说：“哪里只为掩护你？也是为整个抗日的事业应该做的。”他听了，凝视我良久，目光是

那样深邃，很有“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”之感，我脸红了。从此我感到组织更加信任我了，很多重要的机密工作都交给我去完成，我聆听教导也更多了。不久由徐凤山、金成龙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徐凤山同志原来是饶河县的县委书记。

人民群众与抗联的合作，使敌伪的搜捕与讨伐不断失利，并且经常遭到抗联出其不意的打击，于是日寇下决心割断老百姓与抗联的联系，决定实行归村并屯，强迫山区一带的零散户拆旧居，并大屯。在屯基四周筑墙，掘壕建垒，再派军警驻守，宪兵特务监视，象集中营一样把老百姓看起来。这样，将使抗联面临严峻的考验。我把掌握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，并决定改变斗争方式，决不能让敌人捆住我们的手脚，我们要拿起武器与日寇公开战斗。于是我在反日会中串联三十多个青年（其中有我的二弟单有志），做参加抗联的准备。

我的父亲有气喘病，母亲的身体状况只

能将就料理家务，除我和二弟外几个弟妹都小，我们哥俩一走家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，这是逼上梁山的时刻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亡国关头岂能苟安？趁四方林子一带还没有被归并的时刻，我恳请我的父母同意放我和二弟走吧！宁为抗日死也不当亡国奴，父亲思前想后，终于同意了。于是我把家简单安置一下，委托给与我拜把子的八弟阎瑞武，便开始做参军的工作。我对我父亲深怀敬意，他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，却深明大义。当然，也为我们哥俩参加抗联给家庭留下艰难和忧虑，深感不安。这一分别就是十多年，直到1949年才与家通信。

(二)

1937年2月12日夜，四方林子来了一排抗联部队，在一片松林边的刘二姐家停留片刻，等我接迎他们进来，并和部队联系好了持枪到各家去串户“抓人”。把九个青年五花大绑分别拖上五六张爬犁后就松了绑，押着扬长而去。第二天就传扬开了：“四方林

子不少小伙子被红胡子抓走了！”

这种参军方法还真有效，家属没有因为我们参加抗联受到株连，这是我预先和抗联七军三师七团团长隋长清（现名刘建平）谋划好的，那天夜里到四方林子“抓人”，就是我带的路。本来应走三十来人，事到临头有二十来人打了退堂鼓。但也不能讥笑他们是懦夫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参加抗联，真正能达到个人思想通、父母和妻子也通，是不容易的。

我们这九个人到营地后，又有三人吃不了抗联的苦回了家。咱们抗联的政策不能强迫参军，个人自愿。留下的六个：我和姜景礼分配到七军三师一连；李广顺（改名刘志远、现名李忠义）、梁广才（改名侯玉林）、于明礼和我弟弟单有志都分配到三师警卫连。到抗日战争胜利只剩下我和李广顺两个人。梁广才、姜景礼，在1939年和1940年敌人大扫荡中先后牺牲了；于明礼被捕；我弟弟参军后，第二年冬在宝清县义顺浩的一次战斗中负重伤，也离开了部队，到苏联治伤去了。

抗联的编制是军辖师、师辖团、团辖连。武器装备数量不足，质量也差。全军没有一件重武器，机关枪也不多，平均一个连还摊不到一挺轻机枪。百分之八十的人手中有钢枪；但大都是杂牌，又老又旧；子弹也只有三四十发；很多人是拿大刀长矛。在新参军的战士中，我是被羡慕的一个，居然得到一支汉阳造的老套筒，二十发子弹。虽然枪口老得不用勾扳机就可以把子弹头倒出来，但是我很满意；因为有的新战士连大刀长矛也没有，空着手跟部队走。这就是当时我所在的抗联装备情况。经过几次战斗就好了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装备了我们抗联的战士。

在生活上，1938年以前还好过的。每个战士还有鞋穿，冬季能穿上棉衣，夏季换上单衣。有粮食吃，还能吃上菜。从1939年开始抗联生活就艰苦了。

装备差，军粮不足，对抗联来说是难免的。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强大的敌人后方活动，打的是游击战，只有游击区，没有根据

地，装备军需都来自外部。随军只有枪械修理所，进行一般修理。至于制造武器，不过是把空弹壳装成子弹，再就是把破铁锅砸碎了，用椴麻捆起来，再涂上黄泥，晒干后安上导火索制成土手榴弹。就是这样的土造手榴弹，每人还分不到一个。

抗联的军需，1937年前来自几个方面：一是没收汉奸特务的财物；二是向大户募集和靠人民群众支援；三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。凡是从老百姓手中拿到的东西都按价付酬，有时给钱，有时给大烟土。那时虎饶一带种大烟、贩大烟的很多，抗联的大烟土都是大烟贩子捐来的。抗联只要手中有钱，有大烟土，通过老百姓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。但要有所改善，还是靠打胜仗从敌人那里夺取。

(三)

我刚参军就参加了两次战斗：第一次战斗是1937年3月末，在虎林县的独木河区。那里有一段两山夹一沟的公路，是

独木河通往虎林县城的交通要道。敌人因为他们的运输队经常在这段公路上遭伏击，便在东大顶子山上安一个据点，建起碉堡，派了一个排的伪军驻守。为拔掉这个据点，我们用三个连的兵力，一个连主攻（我就在主攻连），两个连打援。战斗打响了，仅用一个小时就把这个据点拿下来了。伪军三个被打死，六个受伤，活着的全部缴械投降。我们缴获各种枪二十余支，其中有一挺轻机枪，还有很多子弹、手榴弹。

紧接着我又参加一次战斗，是在四月初。独木河北山沟里，有一个伪满官吏办的伐木场，老百姓叫它木营，有二百多工人，一支一百多人的森林警察队在那里驻守。我们攻打木营的目的，是为了解决给养和军备供应问题。并要在伪军中建立一个情报联络点。在策略上不是杀伤，而是争取，实质上是要在伪军中建立统一战线。这是一场比在战场上厮杀更要讲究方式的战斗，因此战前我们根据在木营的秘密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情报，做了周密的安排。

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抗联三个连的战士，在低垂的夜幕掩护下，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木营，一敌岗哨先被活捉了，酣睡在营房里的森林警察被我们缴枪不杀的喊声惊起，待要行动，乌黑的枪口、高举的手榴弹正对准他们，只有乖乖就范的一条路摆在他们面前。

先以武力把这支森林警察队震慑住了。于是便把他们集合起来，讲日寇罪行、民族大义，明辨是非荣辱，指出抗日前途，晓以利害，最后提出我们的要求，说明这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。他们虽然为敌伪当了爪牙，但并非冥顽不化，听了我们一番开导很受感动，异口同声表示支援抗日。看到他们有诚意，便和他们官长签署四项协议：一、对这次袭击木营绝对保密。二、及时向抗联提供日伪军活动的情报。三、给抗联购买枪支弹药及应用物资。四、不准欺压伐木工人，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。签字后，把所缴的枪械弹药全部归还他们，为此有些官兵流下了眼泪。

随后又召集木营把头开了一个秘密会，

着重讲了这次攻打木营的目的和意义。会上达成三条协议：一是每月为抗联解决五千斤粮食、若干食盐，及其它一些物资，送到指定地点；二是注意本营伪军行动，有什么动向及时向抗联报告；三是，不得克扣工人财物。以上三项要求绝对保密。

开始我对归还武器有些想不通，认为这等于放虎归山。后来看到签署的协议兑现了，我才认识到自己见识短，思想上存在局限性。体会到在反击日寇侵略战斗中实行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。

(四)

三师接到七军军部的指示——向富锦县进军，开拓游击区。五月中旬，部队从独木河开拔，一路翻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经很多天到富锦县大旗杆，休息几天又出发了，到二道林子驻扎下来。二师的一个团也提前到达这里。

二道林子距富锦县城约五六十公里，是一道东西走向的狭长山岗，有三个村

庄，六十来户人家。部队准备以这一带为据点，开展游击活动。本想休整几天，可是第二天就接到地方党组织的情报，说敌人要来讨伐。我们随即派出侦察小分队，查明一下敌情后再做安排。经过侦察，得知敌人讨伐队已整装待命，有一千多人，其中二三百日军，其余是伪军和警察部队。装备齐全，机枪、大炮、掷弹筒，各种轻重武器全配备上了，其势很凶。

看来，在武器上我们是不如敌人的。三师总计才有四挺轻机枪，二师那个团只有一挺轻机枪，没有一件重武器，子弹也不足。但是形势对我们有利：横在二道林子山岗脚下是一片沼泽地，中间一条公路是敌人从富锦县来犯的必经要道，而这条公路口我们已派重兵把守。打起来，我们居高临下，且有林木掩护。敌人在平川，无所依托。我们还有一个敌人无法比拟的条件，就是我们打的是卫国战争，战士有拼死的精神，人民群众拥护。而敌人，在这方面却是先天不足。因此，师领导决定和敌人打这一仗。